

拉丁美洲华侨华人

流势与境遇：从传统华人时代到新移民时代的阿根廷中国移民

高伟浓

摘要：华侨大约在19世纪末开始移居阿根廷。由于阿根廷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吸收欧洲移民，华侨出国到阿根廷一直受限，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华侨人数十分稀少，在居住地的经营范围狭窄。到20世纪70年代后，来自中国台湾等地的移民日益增多。特别是八九十年代后，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人数猛增。由于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到来，阿根廷的华人数量和经济规模都得到迅速发展，从原来的微不足道，变为居住国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以福建籍为代表的阿根廷中国新移民，迅速抓住阿根廷经济升级转型的机遇，尤其是抓住超市业兴起的契机，建立起自己商业上的半壁江山。那些从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地来到阿根廷的华人投资者，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卓越成果。21世纪后，在当地经济形势艰难发展的形势下，阿根廷华人经济的成绩单仍然亮丽。华商活跃在商业经济各个领域，经营行业广泛，对阿根廷经济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

关键词：阿根廷；中国移民；传统华人时代；新移民时代

作者高伟浓，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华侨史、中外关系。地址：广州市，邮编：510632。

一、传统华人时代的移民涓流与华人小商

作为一个南美大国，阿根廷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较晚。阿根廷曾在1870—1930年间吸纳了大量欧洲移民，以至于19—20世纪的阿根廷成了欧洲移民及其后裔的天下。华侨也是阿根廷的外来移民之一，但人数一直很少。有关华侨最早移居阿根廷的具体时间，即使到了今天仍很模糊，一般认为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他们是一些由秘鲁、巴西、智利等国转居此地的华侨（也有少数人来自北美及中美洲国家），则基本上可以肯定，他们的祖籍多是广州^①。民国政府驻智利公使馆1940年对阿根廷基本侨情调查报告指出，1905年间，有华侨黄伯信等数人来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约隔一年，再有李玉堂等数人来到阿根廷。“此后一二年，渐有船员私逃登岸。直至今日正式入境者少，而私逃登岸者多。”^②按照此说，阿根廷华侨并非直接来自中国，而是来自其他国家的“再移民”。这间接说明其时阿根廷一些地方已有华侨先驱

^①《2009年华侨经济年鉴》（贰）各国个论之三“美洲地区”，（台湾）“侨务委员会”出版。

^②外交部送往驻智利公使馆《指令》，中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2月2日。存（台湾）“国史馆”。

者,于是才有来自他国的后继者。阿根廷虽然总体上已蛮荒初开,但中国人还是不大愿意直接迁居此地。其后,复有一些中国人从广州、山东和浙江青田到阿根廷谋生^①。这些华侨很可能直接来自中国家乡。估计这时候阿根廷已有了一定的华侨移民基础(多半是地缘基础),后续的华侨才可能逐渐增多。另外有研究表明,20世纪初,阿根廷华侨有300人左右,主要集中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多为店员、工人,少数人经商^②。笔者认为,这里说的300人是此前多年间来到阿根廷的华侨总数,时间更后。

到20世纪20年代,大约有20名浙江青田人从欧洲辗转移居阿根廷。他们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招募到欧洲战场的华工,战后一路打短工、卖纸花,凑足船资来到阿根廷。这些年轻华侨散居在离首都1000公里以外的查科省,当时这里应还是一个华侨移民孤岛。由于他们身入蛮荒,孤立无援,举目无亲,又没有后续者,久而久之,只能娶“蛮女”,与当地女子结婚,迅速融入当地社会^③。

然而奇怪的是,就在19世纪20年代,阿根廷只有华侨40多人,到30年代,增加到100多人。再到1940年左右,居留阿根廷的华侨人数为200人左右^④。此后到1949年前后,从中国大陆、香港等地有一批华人到阿根廷,他们携有较多资财,原籍多为浙江、湖南与湖北。早期华人移民人数不多,到20世纪50年代增至300多人^⑤。

中国驻智利特命全权公使张谦曾说过,“侨居留阿根廷境内者为数不多,阿根廷亦不立有任何苛例专为对付我侨,其所受该国法规管理及待遇与他无约国侨民旅居阿境者相同。前虽有华侨三十余人因入阿境时手续非法,未能领得居留证。”张谦因此于1939年曾奉命亲赴阿京(布宜诺斯艾利斯),以私人交情向当地主管机关商准(向华侨)发给居留证^⑥。这说明,当时阿根廷的华侨数量虽然不多,但还是陆续有人前来。这些华侨对目的地国的出入境政策不大了解,本身受教育程度又低,基本上都是听风或跟风、盲目出国而成为非法入境者。

随之,当时南京政府外交部对驻智公使馆的报告不满意,认为“殊欠详晰”,因此在1940年4月10日特指示驻智利特命全权公使张谦,将驻在国境内及阿根廷等处中国侨民最近人数、营业种类、待遇概况、侨团名称组织等逐一调查具报,尤其是“将智阿两国待遇外侨与本国人民之区别,以及外侨入境手续等详细具报,并将各项有关法令原文,速同中文或英法文译本逐一征求寄部备考为要。”^⑦外交部这一指示反映出当时国内对阿根廷侨情的了解一片空白,也说明阿根廷华侨人数很少。遵照外交部上述训令,驻智利公使馆遂对阿根廷的基本侨情再次展开调查。该调查指出,“阿根廷政府对于外侨入境,早已颁行禁例。欧战(笔者注: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执行尤为严厉。无论其有约国与无约国,一律办理。惟如有外侨现在居留阿国境内者,欲接其直属亲系如父子、夫妇来阿同居,则可申请,但请求人须有相当主赡养力,及来阿者品行端正,否则一概不准。至其待遇,各国外侨无论有约国无约国,一律相同,即有触犯法律亦同样施行。独于国家公务员,如为外侨而未入籍者,则不能充任。”^⑧由此可见,在二战爆发前,阿根廷对于包括华侨在内的外来移民,一律执行严厉的入境政策。新来华侨很难被批准入境,阿根廷方面只是谨慎地批准已经居

①杨镛鉴说阿根廷华侨自清末来自秘鲁,皆粤籍。另据其云,青田人是1927年左右从欧洲来到阿根廷,散居在距首都千里之外的恰哥(CHACO)省。参杨镛鉴:《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华侨概况》,(台湾)正中书局,1987年,第41—42页。

②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北京:东方出版社,1983年,第351页。

③参刘文龙、赵长华、黄洋:《中国与拉丁美洲大洋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6页。

④时驻智利公使馆呈外交部:《呈复遵令查报旅智旅阿华侨近况由》,中华民国廿九年(1940年)11月28日,存(台湾)“国史馆”。

⑤《2009年华侨经济年鉴》(贰)各国个论之三“美洲地区”,(台湾)“侨务委员会”出版。

⑥时驻智利公使馆呈外交部:《呈复遵令查报旅智旅阿华侨近况由》,中华民国廿九年(1940年)11月28日,存(台湾)“国史馆”。

⑦外交部送往驻智利公使馆《指令》,中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2月2日,存(台湾)“国史馆”。

⑧时驻智利公使馆呈外交部:《智利阿根廷对于各国外侨政策》(原件无题,此据内容拟),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年)4月22日,存(台湾)“国史馆”。

住在阿根廷的华侨的直系亲属入境。可见,在这一政策下,华侨人数难有大的增长。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阿根廷华侨长期徘徊在一个低水平上。当然,这期间的华侨人数越来越少,很可能还有未把已融入当地的华侨及其后裔计算在内的缘故,也不排除一些华侨由于各种原因而外迁他国。

若进一步探究,阿根廷早年对外来移民的态度是“迎欧拒亚”,即欢迎欧洲人,但对亚洲移民控制较严。所以如此,还应从阿根廷的历史背景和经济发展方面寻找原因。在欧洲殖民者登陆以前,阿根廷的四面八方就生活着一群群处于不同文明发展阶段的原住民。在同一个南美洲大地上,当秘鲁、巴西等南美洲国家的沿海和平原地区发展起来后,阿根廷仍然是茫茫原野,一望无际。如果说前者像是“中原”大地,那么后者就如不折不扣的“南蛮”世界。1502年,航海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一行到达阿根廷(其时称拉普拉塔)^①,成为首次抵达此地的欧洲人。后来西班牙人从拉普拉塔河流域登陆,建立大本营亚松森(今巴拉圭首都),再从该城展开,建立了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简称BA,华人常简称为布宜诺斯、布宜诺)在内的多个城市。实际上在1776年之前,阿根廷一直是秘鲁总督区的一部分。在17至18世纪的大多数年份里,西班牙人为了控制南美大陆的贸易,强制所有与欧洲贸易必须通过秘鲁利马,从而严重损害阿根廷特别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贸易商的利益,导致当地走私盛行,当地人也产生了对西班牙殖民当局的仇怨。1776年,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首府的西班牙拉普拉塔总督辖区建立,阿根廷这块大地才有了一个“圆心”,发展速度加快。之后,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不得已于18世纪晚期终止了所有与欧洲贸易必须通过利马的贸易政策,并宣布布宜诺斯艾利斯为贸易港。但此举的一个后果是加剧了阿根廷当地人民的独立意识,经过斗争,最终于1816年7月9日在阿根廷西北部省份图库曼(Tucuman)正式宣布独立。独立后的阿根廷需要大量外来移民。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阿根廷把引进外来移民的目光放在欧洲,出现了旷日持久的欧洲移民潮。欢迎欧洲移民,控制亚洲移民,成了阿根廷的既定国策,由此导致欧洲移民猛增。一说是1870—1930年间的欧洲移民潮中,累计有400万欧洲人移居阿根廷^②。阿根廷的欧洲移民多属意大利和西班牙血统,也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但比例很低。到了后来,据估计阿根廷3600万人口中,约有1000万人以上有1/2的意大利血统,意大利政府甚至允许他们拥有意大利公民权并在意大利定居^③。阿根廷由拉美“大农村”华丽转身为国际化的“南美巴黎”,其城市建设也完全“欧洲化”,甚至可与欧洲强国的首都比肩,大小街道、公园、市场、各种公共设施的布局与搭配,尽显近现代欧洲城市建筑物的设计风格。20世纪20年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了阿根廷其他地区和周边国家民众趋之若鹜的打卡地。

与欧洲人大规模进入阿根廷形成强烈对照的是,中国人不仅迁居阿根廷时间晚,数量少,且总趋势在减少。上面说到,20世纪初阿根廷的华侨人数虽已增到300多人,但20年代却猛跌到40多人,此后缓慢回升,50年代初才大约恢复到20世纪初的人数。

不过客观地说,当时阿根廷的移民政策虽是“迎欧拒亚”,但主要体现在入境政策上。对于已经入境的华侨,阿根廷的态度还是友善的,没有出现种族歧视行为。对此,中国驻智利公使馆上述侨情调查有记载,“甲、凡侨民正式入境后,两年外可入籍。既入籍,可有选举权及可当公务员。若非正式入境者,认为不合法,虽不严令通缉,但不给居留证,则对于求谋职业上,发生困难。乙、凡正式入境者,与本国人无甚差异。丙、与日本及其他外国侨民之比较无有任何歧视。丁、所在地政府之态度:所在地政府对于侨民,并无鄙视之态度。”关于当时阿根廷方面侨民入境手续与限制(包括对新客与旧客),这个侨情调查还指出,“甲、有关法令条例全文及其分析:查近年阿府颁布移民入境律,严厉禁止新客入境。唯如系直系血统,父子、夫妻及查明其请领入境准照者之生活状况,如何方予以核准。乙、与其本国人民之比较:其本国人民均须领

①在西班牙语中,“阿根廷”与“拉普拉塔”两词同义,均指“白银”,同时寓意“货币”“财富”。实际上阿根廷不产白银。

②《2010年华侨经济年鉴》(贰)各国个论之三“美洲地区”,(台湾)“侨务委员会”出版。

③丘立本:《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国际移民——兼论中国移民的生存发展空间》,《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有国籍证。若由他国复赴阿,有此国籍证明,即行。丙、与热闹及其他国侨民之比较无有差异。”^①

综上所述,在阿根廷独立后的草创时期,外来移民基本上是欧洲人。他们自然占据当地的重要经济领域和行业,华侨只能做那些欧洲人不愿意做的费力劳神耗时艰苦的工作,例如日用小商品买卖、洗衣、饮食和其他务农务工力气活。比较突出的是小商贩,繁杂艰辛,早出晚归,精疲力尽,却收入无多,很难赚大钱,欧洲人自是不屑一顾,只有华侨不得已而为之。好在小商贩相对稳定,如果运气足够好,成为富商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有这种运气的人,应属个案。据20世纪4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委托驻智利公使馆的基本侨情调查,其时除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尚有中国大商号两家及中国餐馆两家外,余均为小本经营或为佣工者^②。据驻智利公使馆对阿根廷的上述调查,1941年左右,“(华侨)人数及最多数之籍贯:旅阿华侨人数约在二百,广东人约九成,浙江人约一成;地域分布:多数居在阿京,少数散后外埠;职业:商店四家,生果店四家,洗衣店三四家,余皆佣工者。”这个调查报告还写道,“查阿根廷我国侨民甚少,且无大公司设立,除开有商店数家外,余均为佣工者。其与所在地经济方面之关系毫无。”顺便指出,由于华侨人数少,侨童适合学者也寥寥无几。当地从无侨民学校之设,报纸刊物亦因人数无多而未创办。但中国国内抗日战争开始后,当地即成立了旅阿华侨抗敌后援会^③。

从华侨出国的角度来说,阿根廷在很长时期内并非热门移民之地。原因很简单:目的地地广人稀,同胞寥若晨星,难以觅到商机。一般来说,早年的华侨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如果要做小商贩,其服务对象首先还是华侨本身。华侨在居住地早出晚归,披星戴月,一天到晚忙碌不休,衣食住行般琐事皆需人代劳,于是华人小商贩才应运而生,且华侨为同胞服务也简单省事得多。此外,华侨小商贩的服务对象才是当地人和欧洲人。显然,如果一个地方的华侨人数少,就必然限制了华侨小商贩的就业范围。一个地方只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华侨才会纷至沓来。华侨人数越多,就越会为华侨自身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由此形成良性循环。这种情况,在拉美国家早期的开发过程中尤为常见。反过来,如果华侨人数长期稀少,就会造成华侨社会的迅速老化,加速融入当地。就阿根廷来说,到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老一辈传统华人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多与当地入通婚,多数人已不会说中国话,甚至外貌上也逐渐失去了东方人的轮廓。

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从中国大陆、香港等地有一批携资而来的华商。他们在这样的特殊年头移居阿根廷,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换言之,这期间少许有钱人移居阿根廷只是一种短暂现象,后来的移居者就不一定是有钱华商了,平民百姓肯定很快再成为移民的主体。不过,即使后来所有入境华侨都是平民百姓,阿根廷的华侨人数依然不多。阿根廷华侨到50年代才增至300多人,有数据显示,直至1972年中阿建交时,阿根廷华侨华人人数方才接近700人^④。阿根廷华侨华人之少,由此可见一斑。实际上,作为一个南美大国,直到1980年以前,阿根廷的华侨移民态势属于涓流式的增长。不夸张地说,阿根廷华商群体的壮大,有赖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福建籍新移民为主体的华侨大量到来。

二、中国新移民与华人超市等业

在新移民时代,阿根廷是先有中国台湾移民,然后才有中国大陆移民。台湾第一批赴拉美的移民于1963年8月20日从基隆港出发,目的地为巴西。20世纪70年代,台湾开始向阿根廷移民。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巴西和阿根廷修改移民法后,台湾人迁居这两个国家的移民潮才逐渐冷却下来。从目前有关

^①时驻智利公使馆:《航邮呈报调查侨务事由》,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年)8月26日,存(台湾)“国史馆”。笔者注:此中的热闹应是地名,但不详何处。

^②时驻智利公使馆呈外交部:《呈复遵令查报旅智旅阿华侨近况由》,中华民国廿九年(1940年)11月28日,存(台湾)“国史馆”。

^③时驻智利公使馆:《航邮呈报调查侨务事由》,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年)8月26日,存(台湾)“国史馆”。

^④白俊杰:《阿根廷华侨华人概述》,载周南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历史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第1页。

资料来看,这期间台湾移民的主要方向是巴西,到阿根廷者少之又少。1980年,阿根廷华侨华人增至1200人^①。笔者认为他们多是台湾移民,已完全当地化的华裔可能未计算在内。进入20世纪80年代,亚洲华侨华人移居阿根廷开始形成浪潮。当时阿根廷政府最欢迎的,是来自台湾的携带资金和技术的移民,因为阿根廷想借助亚洲“四小龙”的资本和人才发展本国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人的入境申请很容易获得批准。当时阿根廷还特为符合“大赦”条件的400多名非法入境的华侨办理了合法居留手续,并给予就业权和营业权^②。1983至1984年,又出现了来自中国、巴拉圭、玻利维亚等地的台湾移民迁居阿根廷的热潮。他们到阿根廷后,聚居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形成了唐人街,人数达数万之众^③。此外,从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人开始定居于巴西、巴拉圭、智利和阿根廷等地。阿根廷的韩国移民定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并在郊区弗洛里斯形成了一个韩国城。韩国移民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投资位于韩国城外的小工厂、制衣车间、纺织厂、进出口贸易公司和其他小公司。阿根廷1985年颁布的一项法律规定,每个韩国移民家庭须在设于纽约的阿根廷国家银行存放3万美元方可发放移民签证(这笔钱最终会返还给这些家庭)^④。显然,从移民类型来看,那个时候阿根廷所青睐的,是投资型的外国移民。改革开放之初以家庭团聚和投亲靠友为主要目的的中国新移民,还不可能出现有实力的投资移民。

1982年4月至6月间,英国和阿根廷因主权争端而爆发“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简称“马岛战争”,西方舆论称“福克兰群岛战争”),英国获胜并重新占领了马尔维纳斯群岛。一部分阿根廷华侨华人在战争期间纷纷他迁,导致华人社会因此大为“瘦身”。“马岛战争”结束后中国新移民的到来,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战争期间华人他迁而造成的人口空缺。1983年,阿根廷华侨华人已达3万人,1988年逾5万人。后因当地经济不景气,约有1.5万人移居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或直接返回台湾。不过返回台湾的人数应该不多,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间,从阿根廷返回台湾就读大学或研究所的人数约有100多人^⑤。但又有资料说,据1988年统计,阿根廷华侨华人约有23000人。这些人包括新老移民,大约有80%居住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⑥。这里有两个数字都发生在1988年,但相差甚大。笔者认为5万人应包括了通过各种途径前来的中国大陆新移民。23000人可能是台湾方面对台湾移民的统计。1999年,阿根廷华侨华人约3万人,其中1.8万人来自台湾,其余来自中国大陆及其他各地。可见到了20世纪末,中国大陆新移民与台湾移民相比仍处于少数。据台湾“侨委会”资料,截至2009年,阿根廷的华人人数约有69500人,其中11000人来自台湾^⑦。显然到了这时,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数已远超过台湾了。另,截至2011年的消息,阿根廷的华人约有8万人(其中福建人一半以上)^⑧。阿根廷20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新移民在阿根廷分布广泛,北至萨尔塔省,南至火地岛省,均有中国新移民定居。但在地域上又趋于集中,居住在首都及周边地区的中国新移民最多,最高峰时占比约95%^⑨。

这里应补充说明,如果只是从移民政策的层面看,阿根廷在20世纪80年代仍是严格限制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例如1984年9月,阿根廷拒绝受理中国公民的入境申请。1987年7月,阿根廷重申中国公民不

①白俊杰:《阿根廷华侨华人概述》,载周南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历史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第1页。

②白俊杰:《阿根廷华侨华人概述》,载周南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历史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第1页。

③白俊杰:《阿根廷华侨华人概述》,载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历史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第1页。

④(美)塔玛·戴安娜·威尔逊著、万红译:《拉丁美洲的东亚移民》,《世界民族》2005年第5期。

⑤《2010年华侨经济年鉴》(贰)各国个论之三“美洲地区”,(台湾)“侨务委员会”出版。

⑥杨宗元:《南美华侨概况》,载世界华文作家协会、南美华文作家协会联合编印:《南美华人天地:三十年来南美华人生活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1999年,第56页。

⑦《2009年华侨经济年鉴》(贰)各国个论之三“美洲地区”,(台湾)“侨务委员会”出版。

⑧刘一:《阿根廷华裔掀起“反黑”风暴》,《北京青年报》,2011年8月20日。

⑨洪桂治、胡建刚、罗燕玲:《阿根廷中国新移民调查研究》,载贾益民、庄国土主编:《华侨华人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98页。

得以旅游签证去阿定居。不过阿根廷没多久就制定了新的移民法,改变了这一歧视性做法。对中国大陆居民,只要符合移民法规定,也一样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入境签证。阿根廷移民政策的这一变化具有标杆意义,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移民大量移居阿根廷提供了重要前提。此后,到阿根廷来的中国移民尤其是福建人更是如过江之鲫。

实际上,就在对华侨移民实行限制的时候,中国新移民就通过各种途径进入阿根廷。20世纪80年代初,从上海、福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和北京等地赴阿根廷的华侨日渐增多,人数达1万以上,其中以上海人占多数^①。渐渐地,中国新移民主要来自福建省,后来成为阿根廷新移民的主体。福建新移民中,又以福州人居多。20世纪80年代后,连江人通过不同渠道陆续到阿根廷创业。到90年代初,长乐人、福清人开始移居阿根廷。以20世纪末的数据,阿根廷大概有18万华人,福建人大概占了80%。截至2011年,阿根廷全国的中国新移民有11万,其中有两三万已经加入阿根廷国籍,仅每年出生的婴儿就有1000多人。阿根廷官方的统计数字则说,中国新移民有12万人,其中有1万多人的籍贯是中国台湾,籍贯福建的有7万人,其中4万多人是从福清移民过去的。另外还有莆田籍的2万人,长乐籍的5000人,闽南籍的1000人,闽清籍的也有几百人,以及一些从平潭过去的。而据连江县侨联统计,到2009年底,该县有1万多人在阿根廷^②。这些福建新移民大多数是在阿根廷各地开超市,而闽清新移民则在那里种植蔬菜^③。不管怎样,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在阿根廷,以福建人为主体的中国新移民迅速增加,人数上已远超过台湾移民。2017年,时任中国驻阿根廷大使杨万明在中阿建交45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指出,在阿根廷的华侨华人约为18万^④。又,统计数字显示,2018年有7103名华侨华人在阿根廷入籍,而最近5年来,加入阿根廷籍的华侨华人平均每年有5000人左右^⑤。

从历史到今天,在移民群体中,闽籍移民是较早形成的一群,其向海外发展的历史可追溯至唐宋时期。福建三面环山,一面朝海,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难以靠种田发家致富,迫使闽人向外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福建人的冒险精神和移民文化,特别是移民流当中的地缘与血缘网络。换言之,福建移民多是通过“一个带一个、一批带一批”的方式来到阿根廷的。福建移居阿根廷的过程,同时也是其乡缘群体迅速壮大的过程。就交通路线来说,新时代华侨出国早已不需要像传统华人那样单纯依靠漂洋过海了,而是从空中飞来飞去,既快捷又方便,尽管有时候还要依靠其他交通工具。例如从北京到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太平洋方向往东飞的距离约为2.2万公里,从大西洋方向往西飞的距离约为2万公里。当然一般都要转机,常规的转机国有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等国,还可以通过墨西哥、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等,不同的国家转机时间不等。很多新移民总结出从哪个城市转机最快、机票最便宜等出行诀窍。

那么,为什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迁居阿根廷的中国移民特别是大陆新移民人数突飞猛进?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阿根廷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经济和社会变化。80年代以来的阿根廷,已成为世界粮食和肉类重要生产国和出口国,有“粮仓肉库”之称。工业门类在拉美国家中属较齐全之列,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甚高。主要食品加工业有肉类加工、乳制品、粮食加工、水果加工和酿酒等。阿根廷为世界葡萄酒主要生产国之一。服务业种类齐全,包括贸易、交通运输、通讯、金融、观光、医疗等主要服务业,皆有大型外商公司直接投资。农牧渔产品在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自然禀赋来看,阿根廷

①白俊杰:《阿根廷华侨华人概述》,载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历史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第1页。

②黄英湖:《海外福建新移民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20年,第19页。以上材料源于作者2013年1月15日参加福建省政协期间对阿根廷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主席、福清同乡会前会长陈RP的访问。

③黄英湖:《海外福建新移民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20年,第19页。以上材料源于作者2013年1月15日参加福建省政协期间对阿根廷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主席、福清同乡会前会长陈RP的访问。

④洪桂治、胡建刚、罗燕玲:《阿根廷中国新移民调查研究》,载贾益民、庄国土主编:《华侨华人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95页注2。

⑤《阿根廷华人总人数已达12万》,2019年10月6日,来源:海员网。

幅员辽阔,农、林、渔、牧、矿及能源等天然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在投资环境方面,尽管阿根廷多年来经济不稳,工业技术相对落后,但一般工业仍然有相当的基础,诸如水、电、公路、铁路及海空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当完善。阿根廷是拉美交通运输最发达的国家之一,铁路、公路、航空和海运均以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中心向外辐射。阿根廷市场开放,经济自由化,国营事业及公共服务业均实行民营化。对国人及外人的投资基本上一视同仁,甚至可以进入一些敏感部门,经营甚少受到限制。总之,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后,阿根廷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民众对高质量生活的向往水涨船高。表现在,一方面对诸如日常生活用品、价廉物美食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另一方面这些行业的工作岗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空缺,为中国新移民在阿根廷就业提供了必要前提。

众所周知,包括阿根廷在内,拉丁美洲主要大国在外界看来保持繁荣的同时,过去数十年间曾经发生过“去工业化”“去制造业化”现象(下面统称“去制造业化”)。在这方面,阿根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回顾历史,阿根廷在近代曾经有过令世界刮目相看的经济辉煌。1910年之时,由于经济增长带来了繁荣,阿根廷曾是拉丁美洲人均收入最高、城市化最领先、文盲率最低、社会群体最多元的国家。到1946年贝隆当选总统时,阿根廷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希望通过自由贸易赚取财富,也埋下了“去制造业化”的伏笔。很长时期内,阿根廷人并不懂得“去制造业化”的负面作用,总觉得生活感觉好就万事大吉。那时欧洲人形容一个人有钱时,就会说他“富得像个阿根廷人”,更是把阿根廷人吹得飘到天上。资源丰富的阿根廷,一时间可与世界大国比肩,并一度在全球排行榜上位列第八。1965年时,阿根廷的人均GDP是法国、英国的六七成,是美国的四成。实际上在这段时期,阿根廷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很快被踢出发达国家行列。据说到1989年,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竟高达3300%!显然,阿根廷发展的深刻教训,就是所谓“中等国家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的转变,社会经济会停滞不前的现象。究其背后的原因,是民粹主义思潮泛滥。不管哪个党派竞选,都要讨好选民。政府为了迎合民意,任意提高福利待遇,远远超过政府财政所承担的能力。同时失去了工业发展的市场与基础,还很容易诱发恶性通货膨胀。

关于阿根廷“中等国家收入陷阱”的问题,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迄今也看不到关于阿根廷“中等国家收入陷阱”问题的深刻论述。不过从某个角度来看,阿根廷的“去制造业化”,直接导致工业品生产的疲软和对外来日常生活用品进口的依赖。这对于中国新移民来说未尝不是好事。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民营企业生产的日用小商品价廉物美,越来越受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拉美民众的喜爱,对于“去制造业化”的阿根廷来说,形成了越来越大的互补关系。实际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来到阿根廷的那一拨华侨中,不少人是乘中国日用小商品畅销拉美市场的东风移居阿根廷的。他们在阿根廷落脚后,很快锁定了超市零售、进出口贸易和餐饮业三大传统行业,作为自己最主要的经营方向。同时,在中国小商品供货方面,从事进出口的新移民和从事超市业(包括批发和零售)的新移民又形成了上下游供应链。他们多是具有同一个地缘关系(福建籍)的新移民,因而对超市业的扩大产生倍数效应。据说一些福建新移民本来是路过阿根廷而转往其他国家的,结果在阿根廷看到满眼都是商机,到处都是淘金机会,不由得心动,于是断然改变计划,在阿根廷居留了下来。新移民当初对当地语言不通,没有多少技能,便从最简单且自己胜任的职业做起。于是,水果店、洗衣店、餐馆、杂货店及中餐外卖店等小本经营类职业,成了他们的首选,也有人从事需要一定职业技能的礼品店、进出口贸易公司、旅行社、律师事务所和咨询等工作。此外,还有一些人以打工为生。所有新移民从事的职业中,超市(也称杂货店)是无可争议的最重要职业。在眼花缭乱的华人行业中,超市业迅速成为福建新移民的支柱产业,据说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超市有九成是福建人开的。其中以家族式小型超市最典型,成为中国商品在阿根廷销售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后,阿根廷随处可见华人超市在出售中国商品,尤其是轻工产品。值得注意的是,红酒、马黛茶等阿根廷名牌商品,因为华人的参与而降低了出口成本。21世纪以来,阿根廷人的消费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生活节奏加

快,越来越多阿根廷人选择在住家附近的中小型超市购物,为华人超市业的蓬勃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阿根廷华人经营的超市价格便宜,薄利多销;营业时间长,周六、周日不休息;华侨华人业主以现金方式向当地货物供货商结算,且很少拖欠货款,信用较好^①。这些既是华人超市的特点,也是优势。据阿根廷华侨华人超市公会2011年8月5日公布的报告称,阿根廷的华人超市中,营业面积在250平方米以上的大超市有9800家,营业面积在250平方米以下的小超市的数量至少在200家以上。华人超市平均每天营业额在1914美元左右。报告称,阿根廷首都和附近地区的华人超市已接近饱和,目前华人超市正向阿根廷内地中小城市发展^②。到2013年5月,阿根廷华人超市已经达到10700家,占阿根廷超市业的79.8%,据阿根廷商业服务工会的数据显示,1/3的基本消费品是在华人超市出售的^③。2014年,阿根廷有华人超市1万家,年销售额60亿美元,主要销售食品和日用品,非常贴近百姓生活。阿根廷本地人到超市购货有一句口头禅:“我上中国人那儿去,马上回来”。到2019年左右,据称阿根廷的华人超市已经开了1.1万多家,4000多万阿根廷人中,预计有800万人在华人超市买东西^④。此外,餐饮业也是阿根廷华商经济的主要行业。到20世纪90年代末,华商经营的中餐馆、外卖店、咖啡馆约有500家,其中约90%集中在首都。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赘。

相对于中国新移民来说,从台湾、香港等地到阿根廷的投资移民,一开始就因经济基础较好而涉足一些新的领域。台湾旅居阿根廷者约15000人,主要聚居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从事自助超市、餐饮、进出口贸易、旅游服务、医药、汽车保养、汽车零配件进口、计算机零配件进口及计算机组装、理发店、钟表零售、渔业捕捞、海运、通讯、房地产、旅馆、停车场、网咖及电话服务店等行业,部分投资食品加工、清洁用纸制造业、手套制造业、塑料制品制造业及农牧业^⑤。总的来说,台湾、香港等地的华商经济也趋于多元化,规模或更大。

与此同时,台湾移民与后到的中国大陆移民的经济差距开始缩小。由于阿根廷从1998年下半年起至2002年上半年历经长期严重经济萧条,台商经营的小型超市难以竞争,利润大幅下降。餐饮业也同时面临竞争,营运呈现困难^⑥。台湾的大型跨国企业如宏达电、华硕及亚洲光学等,皆在阿根廷南方的火地岛与当地厂商合伙建立生产线。经过了2002年金融危机,阿根廷台商部分转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或邻近国家,亦有部分台商返台,鲜有台商至阿根廷投资。据阿根廷台湾商会2013年的保守估计,经由台商投资及直接由台湾岛内母公司对其投资而引入阿根廷的资金已逾1亿5000万美元^⑦。2000年后,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经济状况明显提升。与此同时,台湾移民的第二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在阿根廷接受教育,很多人不愿意接手父母的店铺,而转向其他行业。于是台湾老板将其店铺转卖给大陆来的新移民,后者凑钱买下昔日台湾移民经营的超市或餐馆。到这时,台湾移民与大陆新移民的经营地位,就清楚地显示出前者降后者升的态势。中国大陆新移民很快赚到了可与台湾移民比肩的财富,这也让台湾移民对大陆同胞刮目相看。

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一条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共建的商业街。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中国移民便来到阿根廷,他们惨淡经营,靠经营餐厅与杂货铺白手起家,逐渐站稳脚跟,打下基业,逐渐在这块远离故乡万里之遥的地方建起了一条“中国街”^⑧。“中国街”传承了中国端庄古朴的风格,又熏染了南美洲的浪漫气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街”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富人住宅区——贝尔格拉诺区东部的阿里维

①《2007年华侨经济年鉴》(贰)各国个论之三美洲地区“阿根廷”,(台湾)“侨务委员会”出版。

②《阿根廷华人超市数量超过1万家》,2011年8月8日,来源:南美新闻网。

③《阿根廷近八成自助超市为华人超市 已超过万余家》,2013年5月27日,来源:中国新闻网。

④王素:《“时差11小时”的贸易机会》,2019年8月16日,来源:进出口经理人。

⑤《2007年华侨经济年鉴》(贰)各国个论之三美洲地区“阿根廷”,(台湾)“侨务委员会”出版。

⑥《2007年华侨经济年鉴》(贰)各国个论之三美洲地区“阿根廷”,(台湾)“侨务委员会”出版。

⑦《2013年华侨经济年鉴》(贰)各国个论之三“美洲地区”,(台湾)“侨务委员会”出版。

⑧“中国街”的称呼为阿根廷政府所定,今已约定俗成。当地和外来华侨华人也称之为“唐人街”。

尼奥街,不像世界上很多城市的唐人街,坐落在当地穷人区。直到20世纪80年代,阿里维尼奥街还只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一条普通的街道。其实,“中国街”的历史不长。最早在这条街上开设店铺并形成规模的是台湾移民,故这条街长期以来被称为“台湾街”。该街占了3个街区,主街区长约300米,虽地狭人稠却秩序井然,基本生活设施齐全。阿里维尼奥街出现的第一家出售东方食品和日用品的超市,名“中国屋”。1982年街上落成了教授中文的新兴中文学校,1990年街上第一家药房开张。其后,陆续出现一些餐厅和中国商品有关的店铺。2000年之后,韩国和日本商品也渐渐向此聚集,使这个区域更具东方特色。2006年初,在以老佛爷咖啡厅暨中国文化中心老板、台胞徐玲女士联合部分“中国街”业主代表2003年向贝尔格拉诺区政府提交的“中国街”改造计划的基础上,在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和阿根廷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倡议和推动下,在业主和街区居民的配合下,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将这条街正式命名为“中国街”,并重新进行规划,将之列为该市的旅游景区,规定节假日把“中国街”临时改为步行街,批准由阿根廷华侨华人社团在这条街上建设一座标志性的牌楼,成立了由两岸华侨华人共同参与的“中国街管委会”。2010年,高达11米的精致中式牌楼落成。“中国街”主街道以及与其相交的街道两侧,上百家商铺云集,均由海峡两岸的中国移民经营。每一家店铺占地不大,但此地经营范围十分广泛,诸如超市、杂货店、礼品店、理发店、美容院、电脑店、皮鞋店、服装店、摄影厅、五金店、录影店、餐厅、蔬菜店、豆腐店、咖啡店等一应俱全,还有学校、牙医诊所、按摩诊所、博物馆和佛教寺院,不一而足。每到周末,大量民众前来“中国街”观光购物,平时每个周末的客流量达15000人^①。尤其是每年的华人春节庙会,都在“中国街”举办,众多来自阿根廷各地不同民族的民众纷纷前来打卡。其实,不只是“中国街”,漫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不出三五百米,便能看到一家华人商店。2020年初开始的全球新冠疫情形势严峻。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国街”一带的商户采取线上经营、增加宣传活动等方式应对疫情冲击。2021年10月2日,由“中国街”管委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13区的区政府联合在中国城举办“快闪”活动^②。

华侨华人与阿根廷政府和当地人民相处融洽。阿根廷有尊重外来移民的传统,对有突出贡献者授予“杰出移民”一类荣誉称号。中国新移民中也出现了这样的人物。例如,2013年9月4日是阿根廷一年一度的“移民节”。当天,来自52个移民社区的移民代表在阿根廷移民局总部所在地举行庆祝活动。阿国家移民局局长马丁·阿里亚斯·杜瓦尔发表讲话并向各个移民社区选出的杰出移民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华人进出口商会会长黄菁代表华人移民接受“杰出移民奖”^③。再如2019年10月23日,旅居阿根廷的3位华人荣获阿根廷国家移民局颁发的“最佳移民奖”,分别是:阿根廷华文教育基金会会长刘芳勇、阿根廷华人进出口商会会长薛文强、阿根廷米西奥内斯省华人商会会长林国新。颁奖仪式前,华人议员袁建平代表布市议会向阿根廷国家移民局授予“设立移民节日70年”荣誉牌匾^④。

客观地看,新时期到阿根廷去的中国新移民,并非时时都处于“风正一帆悬”的顺境,他们所遭遇的“逆境”也很多,甚至比很多拉美国家的新移民更加艰难曲折。这种境遇,主要是居住国的经济环境引起的。大体上看,阿根廷经济自1998年下半年开始衰退,由于政府无法有效抑制经济发展颓势,到2001年7月爆发了金融危机。同年12月,阿根廷国外融资中断、国内资金严重外流,遭逢空前严重的金融风暴,进而演变为社会暴动,导致政权数度更换。2002年1月新政府上台后,采取多项重大金融措施,包括止付外债、全面冻结银行美金存款、强制银行美金存款及债务以披索兑美元1:1.4之汇率披索化、取消1比1的联系汇率政策,阿根廷货币比索可以自由浮动,致使经济更加混乱,社会愈加动荡不安^⑤。阿根廷于2012年起

①《阿根廷中国街两岸侨胞迎新春,龙点睛揭新篇》,2008年2月9日,来源:中国新闻网。

②吴侃:《多国唐人街在疫情困境中寻生机》,2021年11月12日,来源:中国侨网。

③《华人移民赢得阿根廷主流社会尊重 获杰出移民称号》,2013年9月6日,来源:中国新闻网。

④据2019年10月24日电阿根廷华人网报道;环球时报在线(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9年10月25日。

⑤《2007年华侨经济年鉴》第二部分各国个论之四中南美洲“巴西”,(台湾)“侨务委员会”出版。

严格执行进口限制,此外,为维持外汇存底以偿还外债,严格管制外汇买卖,抑制资金外流,美元官价及黑市价之间的差距大为减少。为了达到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减轻外债包袱的目标,政府实施进口替代策略,发展国内产业、推动产业复苏,增进就业人口、利用贸易救济与防卫机制,保护国内产业、稳定汇率,控制通胀、强化税收,健全财政收支等措施。由于欧美的金融危机,阿根廷彻底抛弃了“新自由主义”,转向行政干预的发展模式^①。

阿根廷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已经移居当地的华侨华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特别是对从事进出口贸易和超市业的华侨华人冲击最大。冷静地看,尽管阿根廷国际地位有大不如前甚至每况愈下之势,但中国新移民仍然纷至沓来。究其原因,固然是因为中国新移民可以承受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及可能的消极影响,但也应与新移民主要从事杂货业和中国商品进出口密切相关。这些行业给中国新移民带来了不少财富,也对阿根廷的经济发展贡献良多。总的来说,阿根廷这一时期的经济现状,没有“吓退”中国新移民。他们坚定地留了下来,继续为居住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结 论

在拉丁美洲,阿根廷在20世纪的中国移民大体上经历了流量小、境遇差的前一个50年,以及流量增大、境遇改善的后一个50年,两个50年的反差甚大。21世纪后,在经济形势艰难发展的形势下,阿根廷华侨华人顽强坚守,砥砺前行。作为一个移民国家,阿根廷19世纪几乎清一色地吸引了大量来自欧洲的移民。到20世纪下半叶,时代让分别来自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成了阿根廷的主要外来移民。到21世纪,阿根廷的华侨华人大抵可分为三部分:一是老(传统)华人,人数不多,他们中多是早年来自广东、浙江和山东等省份;二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移居阿根廷的台湾移民。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他们中福建新移民居多,其余人来自上海、山东、广东等地。福建新移民是通过“一个带一个,一批带一批”的乡缘移民网络移居阿根廷的,他们逐渐成为阿根廷华人社会的主体。绝大多数新老华侨华人居住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及其近郊,其他人分布在科尔多瓦、罗萨里奥、图库曼及福莫萨等省市^②。

由于大陆移民的到来,阿根廷的华人数量和经济规模都得到迅速发展,从原来的微不足道,变为居住国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以福建籍为代表的阿根廷中国新移民迅速而有效地抓住阿根廷经济升级转型的机遇,尤其是抓住超市业兴起的契机,建立起自己商业上的半壁江山。那些从台湾、香港等地来到阿根廷的华人投资者,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虽然阿根廷陷入了“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华人经济的航船也随波澜起伏,但阿根廷华人经济的成绩单仍然亮丽。华商活跃在各个领域,经营行业广泛,对阿根廷经济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今天,中阿两国又在“一带一路”项目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紧密合作。可以相信,旅居阿根廷的华侨华人将继续做出更大的新贡献。

(责任编辑:黄文波)

^①《2012年华侨经济年鉴》(贰)各国个论之三“美洲地区”,(台湾)“侨务委员会”出版。

^②白俊杰:《阿根廷华侨华人概述》,载周南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历史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第1页。

.....Kang Xiaojuan(31)

Abstract: Yokohama Yamamoto Chinese School (formerly known as "Datong School") in Japan was founded in 1898 and is the world's first overseas Chinese school with modern significance. It can be seen as 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the modern school system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he traditional form of school. The "Centennial Annals of Yokohama Yamamoto Chinese School (1898-2004)" records the school's founding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ver the past century with detailed historical materials, rigorous descriptions, and scientific cataloging. Its school history is at the same historical stage as the world and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 for studying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This study takes the work as a research sample, summarizes its content, analyzes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proposes its research valu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ology, education, linguis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tc.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Overseas Chinese School; School History; Japan

The Rol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New Zealand in China Singapore "the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 Cheng Tongfang, Li Aihui(42)

Abstract: Since the sign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New Zealand and China in 2017, the contac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fields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trad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have been greatly expanded,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high-level exchanges and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has been deepened. 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 have seized this great opportunity, taken their advantages of integrating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built a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 with individuals, enterpris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as outlets, thus actively promoted policy communication, economic and trade smooth,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New Zealand, and made unique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Howeve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living in New Zealand are facing challenges of Anti-Chinese sentiment, resurgence of racism and decline of favorable impression towards China in New Zealand society. China and New Zealand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need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New Zealand, and respond to them from political mechanism, economic and trade mutual benefit, and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so as to encourage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New Zealanders in the Belt and Road Win-Win cooperation.

Key words: New Zealand; China; The Belt and Road; Overseas Chinese

Exploration on Social change of Chinese Canadian Liu Tao(50)

Abstract : The ethnic Chinese have been immigrating into Canada since 1960's, Chinese population and communities has complex change process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immigration policies, the Chinese society also changes continuously and presents different features at the different stages.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in Canada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diversity of educational background, soci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e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with Canadian countries.

Key words: Chinese Canadian; Immigrants; Social Changes

Analysis of Localization and Motivation of Returnees in the Context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The Case of

Changlong Overseas Chinese Farm in Lianjiang County in Fujian Province Su Mulan(59)

Abstract: Fujian Changlong Overseas Chinese Farm has been developing for decades, with many changes in the leadership system. In this context, the returnees are influenced by specific factors such as the management system, collective memory, identity, and specific spirituality. Under these influences,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returnees has been promoted, and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local integration have appeared in three aspects: social security, labor production, and rituals and customs.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role of identity and group memory,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of the returnees is also incomplete, and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ts localization process.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Reform; Localization; Motivation Analysis

Flow and Circumstances :Chinese Migrants from the Traditional Era to the New Migration Era in Argentina

.....Gao Weinong(68)

Abstract: Chinese started to migrate to Argentina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s Argentina has long favored European migrants, the overseas Chinese to Argentina has been limited until the late 1940s and early 1950s, when the number of overseas Chinese was

very small, and the scope of business in their residences were narrow. By the 1970s, migrants from Taiwan and other places in China were increasing. Especially since the 1980s and 1990s, the number of new migrants from China's mainland has soared. Due to the arrival of new migrants from China's mainland, the number and economic scale of Chinese in Argentina have been rapidly developed, from the original insignificant, to a force to be reckoned in the host country. The new Chinese migrants in Argentina, represented by Fujian province, quickly seized the opportunity of Argentina's economic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especially the opportunity of the rise of supermarkets, established their own commercial domain in the country. Chinese investors from places such as Taiwan and Hong Kong have also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After the 21st century, despite the difficult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conomic situation, all the report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in Argentina are still bright. Chinese businessmen are active in various fields in their residences, operating in a wide range of industries, and contributing greatly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rgentina.

Key words: Argentina; Chinese Migrants; Traditional Chinese Migrants Era; New Migration Era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New Chinese Migrants Communities in Latin America---A Case Study of Chinese Supermarket Community in Argentina Zhu Yiming, Qin Tiancai(78)

Abstract: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in Argentina had non-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or long time, and their practice and the reasons behind it deserve attention. Taking the Chinese Supermarket and Self-service Supermarket Community in Argentina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overseas Chinese in Argentina are facing a severe environment in terms of social security and government governance, which can only be changed by unit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rough community. The non-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has two main themes as opposing discrimination against overseas Chinese and protecting the security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Argentina. They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non-institutionalized contacts, representations and negotiations.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communities can be achieved basing on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supermarket Chinese merchants on prices, as price issues are related to Argentina's social stability and election. And its influence comes from the efficiency advantage of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 the scale advantage of market occupation, and the unite character of Fujian Chinese.

Key words: Chinese Supermarket Community;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rgentina